

《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》（四）

—

一 经济压迫

迫，生存艰难

职业剧团以演戏为生，不得不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。捐税只是演出成本的一部分，如果再加上付给剧作家 3% 的上演税，付给导演 2% 的导演税，和演职员的工薪、场租、装置费等，总数远远超出了票房收入。所以，1943 年以后，国统区的全部职业剧团，不仅民办的中华剧艺社、新中国剧社、中国艺术剧社先后陷于入不敷出，负债累累的局面，即使官办的中电剧团、中万剧团、中央青年剧社等也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，不得不减少演出，以免亏蚀。

随着话剧危机日益深重，许多进步剧人如马彦祥、陈白尘、刘念渠、章罍等，以及国民党内象潘子农、田禽这样一些比较明白的剧人，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：当局要求“戏剧非有教育意义不可，不得与抗战无关。而另一面将营业税、娱乐捐、节约建国储蓄券、冬令救济捐款等，一层一层地堆压上去的时候，戏剧又分明是纯营业性的纯娱乐性捐税的对象”。[i]一方面视戏剧为“社会教育”、“宣传武器”，[ii]办剧校、组剧团、建剧教队，甚至还有“若干党政要员都在不遗余力地倡剧运”；而另一方面“戏剧又被视为娱乐，课以重税；演剧被认为‘不正当行为’，与娼妓同被取缔；一切戏剧从业员，则又处于饥寒交迫之中，生活毫无保障”。

“无疑的，这政策之消极作用是超过了积极的领导的”。[iii]突出表现是，在物价飞涨、高捐税、低票价的三重压迫下，抗战后期演剧一步步陷入赔本经营的恶性循环，剧人生活日益艰难，剧团难以维持简单的艺术生产，更无扩大再生产的能力。

应该说，在 1939 年以前，国统区的经济虽然通货膨胀严重，1 月份零售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6.9 倍，8 月即达 11.8 倍，但由于工业生产发展较快，总体情况还比较平稳，物价管制大体上也局限于一些战略物质部门。所以，1939——40

年票价虽然上涨了5倍，但仍低于同期物价指数。况且这时的话剧尚未恢复商业性演出，剧人多属官办剧团或另有职业，生活有一定的保障，演剧还不必太多考虑成本与市场问题。1940——42年期间，货币发行量激增，“物价也是天天上涨，但在演剧运动中仍未成大的障碍。几万块钱的布景服装，团体经常一切演出开支等等，还可以在票价收入中得到抵偿，甚或有些盈余。”^[iv]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税赋低，不限价，票价跟着物价涨，抵住了通胀的冲击。

从表2可以看出，1942年实行票价管制以前，票价是以5元一个台阶向上攀升的，而42年票价管制以后却是以10——15元一步向前飞奔的，但仍然远远赶不上同期物价上涨的指数。在这个时候对话剧开征娱乐税又限制票价，无疑于雪上加霜，一下子就把话剧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渊。1944年西南剧展上曾展出过一张新中国剧社的《物价票价增长比较表》，“三十年是平的，三十一年相差不多，三十二年物价就高出很多，今年就更相悬殊了”。^[v]所以，无论是剧团经营还是剧人生活，从1942年起，便愈益陷入艰难竭蹶之中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

“物价高涨，必然影响到生产成本之激增”^[vi]。战前上海业余剧人协会（1935年4月成立，1937年5月职业化）最豪华的制作，投入也不过300元左右，到1940年2月四川省立剧校熊佛西执导自编的《赛金花》，投入近4000元，票价5——10元，人们担心的只是“没有钱的人无缘瞻仰”。^[vii]1943年6月“平均一个戏用到15——20万”^[viii]，而到同年10月，“任何一出戏的预算开下来都得50万以上。而票价不能加，（遵检）观众购买力似乎也不能再提高了”。^[ix]这里所说的50万还不包括剧团的劳务、伙食、房租等经常费在内。括号内的“遵检”字样，说明引文在发表时被检查官删去了一大段，所以文意连贯不起来了。按上下文推断起来，也许说的正是在高通涨的形势下，高税低价政策对演剧的伤害。几乎与该文同时，发表在1943年11月版的《戏剧时代》创刊号上，署名今的《票价问题与捐税》提供了一种标准的算法：按最高票价计，票房收入50元/座—50×50%娱乐税—50×3%营业税—50×10%印花稅—3%上演稅—2%导演稅，共34元，余16元，再减去40%院租，剧团实收不过9.6元。也就是说，最少须售出5万多张上限票，连演70场以上（按每场上座700人计），两个月才能勉强平衡一出戏的收支。这是就官办剧团而言。如果是民办职业剧团，再加上当时每月约8万元的经常

费，还本周期还得拉长。这还只是一种静态的理论算法，实际上当时物价是一天一个样，“一方面是剧团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及戏剧演出的成本日益提高，一面是观众的消费能力日益减低，观众日益减少”，[x]直到抗战胜利，国统区都未见有一个戏连演 70 场以上的纪录，与 50 万的巨大投入比起来，“无论在重庆任何一家剧场演戏，这种比例的收入都无法收支相抵”。[xi]至于必要的积累，则根本谈不到。

“经济问题不单妨碍了演剧运动的发展，而且可能窒息剧团的生命。”

[xii]到 1944 年，演剧已经到了几乎难以为继的地步。陈白尘在其长文《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》中，根据官办的中电（中电剧团，1938 年 9 月成立于重庆）、中万、中青，和民办的中艺、中术、怒吼（怒吼剧社，1937 年 9 月成立于重庆，业余性质）等六大剧社的新近演出数据，经分析后得出结论：以平均演出 20 场计，每演一个戏，有经常费的官办剧团赔本 5 万元，无经常费的民营剧团则要赔本 21 万元；官办剧团演出 45 场“或可保本”，而民营剧团“虽演至无穷尽场数，亦永无还本之望了”。所以当时就有人说，“照此情形，民营的职业剧团果非破产不可，官办的剧团也不见得有大堆基金可资赔累，我们就算用尽最后一点人力来撑，恐怕未必撑将下去”。[xiii]所以，1943 年以后形成了这样一种悖谬现象：重庆的“两职业剧团（指中艺和中术）明知要赔钱，但剧团开销的压迫却还不得不演下去。中剧负责人金山说，不演戏一个剧团的开销要七八万，而演了戏也要赔几万元，两样一比，演了戏总还算是少赔一点钱”，“一些国家经营的剧团，为了赔不起钱”，[xiv]则干脆停顿。所以，象中艺这种民办职业剧团，为了生存，不得不一边尽量节衣缩食，一边设法举债排戏，维持营业。而一旦上座不佳，就无望还本，终至负债累累。1943 年夏，中艺远走川西，国民党的政治迫害诚然是一个重要原因，另外一个原因是“因背了很多债不得不离开重庆”，以一走了之[xv]。1944 年初，中万排演冒舒湮的获奖剧作《董小宛》，投资 100 万，而神鹰剧团（空军）排演《铸情》（即莎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），投资更达 200 万之巨，演剧的经济风险是非常高的。到 1945 年 4 月，就连有着特殊背景[xvi]的中术都到了债台高筑（400 万），濒于破产的地步，其它剧团生存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1942 年以后国统区话剧市场的萎缩，演出数量的减少，恰恰相反，演剧仍在持续高涨，观众热情依旧，只是在重压之下话剧的本性发生了悄悄的

扭曲。

高额捐税褫夺了剧团应得的收益，物价与票价的剪刀差更将演剧推入亏损的深渊，话剧几乎被逼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剧人生活日趋恶化。中艺、中术、新中国等民办剧团的基本演职员根本无薪酬可言，只吃大锅稀饭度日。所以陈白尘结婚好几年都不敢要小孩，年轻美貌的妻子看上一种普通布料的裙子，丈夫却买不起，直到解放后才了此心愿。中电、中万、中青等官办剧团的演职员是有薪酬的。据《商务日报》报导，1943年初几位明星的工资是：黎莉莉最高，也不过340元，舒绣文330元，白杨320元，张瑞芳300元，施超280元，谢添250元，吴茵230元，叶露茜120元，秦怡60元。而米价是630元/石(500斤)，糖130元/斤，哈德门香烟75元/包。还是这些人，1943年中，工资上涨到700——1000元，1944年2月即达2000元左右。和1937年上海业实的职业剧人的收入相比，净增40多倍。[xvii]但同期物价却上涨了2000多倍，生活水准降低了不知多少。“特别是在职业剧团，必须靠了营业收入来维持全体生活的场合里，多数工作者是没有法子休息的”。“一切戏剧从业员，则又处于饥寒交迫之中，生活毫无保障”，[xviii]“几乎与叫化子一样”。[xix]有的演职员为了维持生计，只好节衣缩食，走穴赶场，设法挣点外块，补助生活。营养不良，再加过度劳累，百病缠身，使许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剧人英年早逝，如江村和施超死后连墓地都是友人车辐捐献的。也有的为了剧社的生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如中艺的前台主任（兼群益出版社经理）沈硕甫，孤身一人，长期带病工作，最后死在赶赴剧场的路上。入殓时内衣破烂得不堪入目，令所有中艺同仁为之恸哭失声。

[i] 夏衍：《我们要在困难中前进》，1944年2月15日《新华日报》。

[ii] 鲁觉吾《中国话剧运动总检讨》一文，劈头就说“总裁最近指示：‘电影戏剧是宣传最有效的工具’”。见1943年10月24日《中央日报》。

[iii] 徐乘驷：《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》，《戏剧月报》第一卷第

五期，1944 年 4 月。

[iv] 章罍（张颖）：《剧季过去和现在》，1943 年 10 月 21 日《新华日报》。章罍即张颖，时任周恩来的文化秘书。据她和本文作者讲，当时她写的不少文章（如署名茜萍的《评〈北京人〉》等）都经过周恩来的修改。本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政策水平，即高度的原则性与充分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，显然是代表了中共的话剧理念。她还隐约记得该文曾经过周恩来修改。——笔者 2000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采访张颖的记录。

[v] 记者：《参观戏剧资料展览》，1944 年 3 月 20 日《力报》。

[vi] 谢复苏：《我们要扫除障碍》，《戏剧月报》第一卷第五期，1944 年 4 月。

[vii] 莫莎：《正二月的成都剧坛》，《戏剧战线》第一卷第六期，1940 年 2 月。

[viii] 刘念渠：《坚持工作 争取工作》，《戏剧时代》第一卷第二期，1944 年 1 月。

[ix] 章罍：《剧季过去和现在》，1943 年 10 月 21 日《新华日报》。

[x] 史东山：《今日戏剧的命运》，1944 年 2 月 15 日《新华日报》。

[xi] 章罍：《剧季过去和现在》，1943 年 10 月 21 日《新华日报》。

[xii] 章罍：《剧季过去和现在》，1943 年 10 月 21 日《新华日报》。

[xiii] 谢复苏：《我们要扫除障碍》，《戏剧月报》第一卷第五期，1944 年 4 月。

[xiv] 记者：《剧人昨天纪念戏剧节 希望解除一切困难——马彦祥历述戏剧界艰苦奋斗的情形》，1944 年 2 月 16 日《新华日报》。

[xv] 记者：《剧人昨天纪念戏剧节 希望解除一切困难——马彦祥历述戏剧界艰苦奋斗的情形》，1944 年 2 月 16 日《新华日报》。

[xvi] 中术是中共组建并领导的民办职业剧团，中术负责人之一的金山 1932 年即已加秘密入共，国民党中宣部官员潘公弼是他姐夫，银行家赵班斧是他哥哥，大流氓杜月笙则是他师傅，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给中术的演剧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。

[xvii] 1937 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实验剧团的最高月薪是 60 元。严恭为

国立剧校表演专业第一届毕业生，在业实定为 40 元。当时重庆的米价不足 10 元/石(500 斤)，可供比较。

[xviii] 徐乘驷：《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》，《戏剧月报》第一卷第五期，1944 年 4 月。

[xix] 若海：《十个月里的四次演出》，《戏剧时代》第一卷第二期，1944 年 1 月。

厦门大学图书馆